



# 沽北春秋

中共天津市北郊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沽北春秋

中共天津市北郊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沽 北 春 秋

---

中共天津市北郊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

天津市北郊区第一印刷厂 印刷

199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9千字 印数1—3000

---

准印字：津北郊图字（91）第010号

# 目 录

|               |        |
|---------------|--------|
| 安幸生小传.....    | ( 1 )  |
| 子牙河畔的明灯.....  | ( 10 ) |
| 北运河畔救亡声声..... | ( 18 ) |
| 地下军的故事.....   | ( 23 ) |
| 神出鬼没的游击队..... | ( 29 ) |
| 韩家墅战役.....    | ( 33 ) |
| 秘密交通线.....    | ( 37 ) |
| 堡垒村韩盛庄.....   | ( 40 ) |
| 智抢麦秋.....     | ( 46 ) |
| 洋灰桥打“狼”.....  | ( 49 ) |
| 请君入瓮.....     | ( 51 ) |
| 智勇擒敌.....     | ( 54 ) |
| 捉“舌头”.....    | ( 56 ) |
| 虎口脱险.....     | ( 58 ) |
| 绝路逢生.....     | ( 61 ) |
| 他们悲壮地倒下.....  | ( 64 ) |
| 一支自动步枪.....   | ( 70 ) |
| 争取张培卿.....    | ( 75 ) |
| 活捉宋宝霖.....    | ( 79 ) |
| 锄奸记.....      | ( 83 ) |

## 安幸生小传

安幸生原名安毓文，号仁岗，1902年生于天津近郊三河头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年丧母，姐弟五人，排行第二，父亲安维礼年轻时崇尚“新学”，在当地兴办了三河头小学。安幸生便在这里度过童年。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今天津市第三中学）。由于他聪颖过人，擅写作，长雄辩，深得语文教师董恩祥的喜爱。他生活俭朴、热爱劳动、关心时事，常与高年级同学于方舟等探求救国济民之理，初步树立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信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来，安幸生、于方舟等天津青年，热血沸腾，群起响应。5月6日他作为一中代表赴北洋大学参加了天津10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积极参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筹备工作，接着又率领全校学生参加了天津各界“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和5月23日全市学生罢课大示威，并赴省公署请愿，强烈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安幸生显露了组织和领导才能。

为了更好地团结天津广大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安幸生和于方舟、韩致祥（麟符）、李小五、王隶华、王同华等同学继周恩来组织觉悟社之后，于1919年10月组织了新生

社。随后在李大钊直接指导下，他们认真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革命刊物，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1920年4月1日，新生社创刊《新生》杂志，安幸生任主编，撰写了大量诗文社论，发表新生社的主张，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因此《新生》杂志被社会誉为“全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是年秋，安幸生、于方舟把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2月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起了天津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强行解散社团，查封《新生》杂志，安幸生也被捕入狱，身陷囹圄后，他备受非人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后经其父、姐夫和于方舟的多方营救获释。

安幸生出狱后，已被学校除名。被迫暂时回到老家三河头村。在家乡他经常和“下人们”一起干活吃饭。他十分同情、关心贫苦农民。秋收时节，困难人家求他家给拉趟庄稼，车把式担心掌柜的不愿意，他就掏出自己的5元钱交给车把式，说：“去吧，这是人家的定钱。”有时见到妇女、小孩在他家地里拾庄稼，他就说：“别拾了，每人背一筐回家吧。”1921年冬，安幸生根据当地群众请求，领导了反对当局无理收缴“烧炭税”和“割头税”的斗争，取得胜利，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从1918年到1927年，安幸生先后9次回家，每次都找学校老师学生谈理想，深入农民中讲革命。他曾对乡亲们说：“咱三河头村南这片地，将来全要发展成工厂，不能象现在这样大柳行子、沙丘地”。姐姐则劝他：“他东跑西颠的总出事（安幸生在天津曾7次被捕）图个嘛？家里人都跟着担心。”他却说：我做的事是让大家都有地种、有饭吃，都能过上好日子。象咱家这些地，除去咱这几

个人的，都要分给大家种！”

1922年春节以后，安幸生返回天津市内。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在天津设立了支部，安幸生为支部书记。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安幸生领导的天津支部积极响应，并于1922年8月27日致电国会参众两院，强烈要求国会迅速通过《劳动法大纲》。1922年10月，唐山开滦五矿举行总同盟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又积极开展了募捐后援活动，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持。同年秋，安幸生由罗章龙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1924年1月，于方舟和共产党员江浩、李锡九奉中共中央之命在天津建党，安幸生参与了建党活动。当时，天津有共产党员7人，共青团员45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3月9日，安幸生参加了在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7月，又与于方舟等筹建了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安幸生任执委，分工负责海员与码头工人运动。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安幸生白天深入海员码头工人之中，了解工人的疾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反帝统一战线的各种活动；晚间住在地委机关和于方舟、卢绍亭、李培良等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同年“五一”、“五四”、“五七”，天津各界群众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安幸生均参与筹备并领导了这些活动。

1924年8月，安幸生响应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的号召，联络天津26个团体，成立了“天津反对帝国主义联盟”，并任委员长。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联盟宣言》，表示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9月7日天津反帝大联盟发动全市工商学各界停工停课，举行“九七”示威大会，他在会上发言并提议：由九七大会致函国会，“宣布帝国主义的罪恶。”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2月4日，孙中山抵津。于方舟、安幸生等天津党、团地委领导，联合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动员和组织了万人欢迎大会，并于12月18日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安幸生为临时书记兼文书科主任。12月27日，安幸生与于方舟、邓颖超等5人被选为“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起草委员，撰拟该会章程、宣言、通电等重要文献。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赴京，邓颖超、于方舟、安幸生等天津各界代表200余人到天津车站欢送。1925年1月3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安幸生为书记。随后，该会组成讲演队，在东马路、西马路和北马路讲演所分别讲演，号召各界人民团结在新三民主义旗帜下，打破“善后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正当广大民众热切盼望国民会议举行的时候，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开，哀思笼罩天津。中共天津地委在很短的时间里即组织了各种悼念活动70余次，安幸生多次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伟大功绩。3月14日，天津全市国民党员召开遥祭大会，场中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及党旗，并有“继承总理遗业革命到底”的白布大旗，

安幸生致悼词。“声显而哀，泪如雨下，全场大恸。”4月19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安幸生任党务科职员。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安幸生、于方舟、邓颖超等的大力组织、发动和宣传，天津广大民众对孙中山主义有了深切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为后来的天津群众革命运动打下了基础。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把主要工作放在工人运动方面。安幸生、李培良等通过举办平民识字班的形式，发动群众、联系群众，帮助各工厂、码头建立基层工会，成绩显著。1925年5月1日，安幸生参与地委组织天津各行业工人示威游行，纪念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5月6日，天津宝成纱厂资本家借故开除一名女童工。为保护工人利益，打击资本家对工人“生杀予夺”的气焰，党和工会发动该厂工人罢工，劳资双方僵持，引起各界对工潮的重视并组织调解。安幸生奉党组织之命参加了这次调解。在与资方谈判时，他慷慨陈词，驳斥资方种种借口，迫使资方接受工人提出的三项要求。5月7日，天津60多个团体在南开操场举行“天津市民‘五七’国耻纪念会”，安幸生为秘书股主任。5月12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这一盛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津人得讯后，莫不发指”。安幸生立即组织“天津反帝联盟”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宣言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1日，天津各界召开反帝示威游行大会，他首先报告上海惨案详细经过，激起群众无比愤慨，讲话不断被反帝口号声打断。6月5日，天津学界万余人罢工集会游行，声援沪案。他又代表全市学生在大会上宣读誓词：暂死与英日断绝经济关系，打倒

帝国主义，并联合弱小民族，实行民族自治。为使反帝爱国斗争深入开展，安幸生与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人于方舟、邓颖超、江浩分头联络，于10日在天津总商会成立了代表全市80万民众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参与起草了联合会的章程、宣言和通电，并当选为联合会交际员、讲演员和监察员。6月<sup>1</sup>4日天津各界10余万人在南开操场再次召开反帝市民大会，声讨英国海军在汉口枪杀、枪伤数百名游行华人的罪行。会上，安幸生、邓颖超等7人被推举为代表，向直隶督办军务公署和直隶省长公署请愿，提出“惩办凶手担负赔偿恤金”等五项要求。督办李景林不得不表示：“所有请愿条件，吾当极力向中央陈请。”这次集会后，天津200余群众团体纷纷加入天津各界联合会。6月30日，中共天津地委又第三次组织市民大会，反帝声势更加高涨。

1925年7月18日，在安幸生的组织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天津支部”在法租界长春大旅社召开成立大会，安幸生被选为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先期从香港到达天津的全体海员宣布罢工并发表声明，决心“与强暴的英国人反抗，非达最后目的暂不上工”。随后陆续到达天津的“顺天”、“朝阳”等轮500余名海员也加入罢工行列，同时在日商大连、大阪和英商怡和、太古四个码头工作的2000余工人也举行了同盟罢工。在罢工斗争中，安幸生和工人们生活、战斗在一起，积极组织筹款，补贴工人生活，激励工人斗志，使罢工斗争给了英、日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为统一领导天津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1925年8月4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了纺织、油漆、地毯、铁路、制鞋等20多个工会成立了“天津总工会”，安幸生为委员长。由

此，形成了天津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坚强核心。

1925年8月9日，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总工会发动宝成、裕大、北洋、裕元纱厂20000工人为反对宝成资方苛罚女工余阿英案举行同盟罢工，军警赶来与宝成纱厂工人发生冲突。中共天津地委根据剧变形势，决定将罢工主要场所转到日人操纵的裕大纱厂。当晚，安幸生、吕职人等各界代表赶到宝成纱厂，打破僵局，同厂方达成复工协议。8月11日下午5时，裕大纱厂数千名罢工工人遭到奉系军阀李景林的残酷镇压，拘押了安幸生等各界联合会代表19人和400余名罢工工人。查封了天津总工会等群众团体。各界代表先被关在督查处，后转入第三监狱关押。

在狱中，安幸生和其他共产党员李希逸、辛璞田、姬兆生、吕职人组成党小组，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狱中斗争。直到12月25日，国民军占领天津时安幸生等人才光荣出狱。中共天津地委为表彰他们的革命精神，赠予每人“革命先锋”纪念章一枚。

1926年元旦，天津各界团体在南开操场集会欢迎国民军。安幸生讲演，表示要与国民军一道为打倒一切军阀而奋斗。当日下午，天津总工会举行升旗礼，安幸生以总工会秘书身份作报告，号召“各工友加倍努力，以期得到最坚固之团结”。1月17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安幸生当选为农工部委员。

在国民军驻津期间的1月至3月，天津地委接连组织7次大规模的集会和纪念活动，安幸生均参与了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6年3月12日，日舰击毁大沽炮台。18日，发生“三

一八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立即于3月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安幸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提出“抵制英日货”等13条议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暴行。3月21日在全市“废约驱段（祺瑞）”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代表，向直隶督办孙岳和驻津总司令鹿钟麟请愿。

但是，第二天，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整个天津城处于白色恐怖中。据此，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疏散暴露的党团员。安幸生遂奉命于1926年夏调往上海等地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查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杀害李大钊等革命领导人，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同年5月，安幸生参加中共“五大”会议后回津，不久被党组织调往北京，同蔡和森、王荷波一道从事恢复北方区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当时党的机关暂设在董季皋（以张作霖大帅府贴身秘书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党员）家里。

经过3个月的艰苦努力，8月1日，北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安幸生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在繁忙艰苦的工作中，安幸生的优良品格和革命精神，为董季皋的女儿董恂如所倾慕。同年9月18日由蔡和森做媒，他们结为伉俪。婚后3天，安幸生就投入筹建北方局、组织人民武装的工作。不久，党组织决定，待筹建北方局工作完成后，送他到苏联学习。

但是顺直省委9月改组后，把“八七”会议出现的“左”倾情绪带到北方来。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北

方局和顺直省委关于发动工农暴动的指示，发动全市党团员公开走向街头搞“广告暴动”。一夜间，传单、标语遍布全城，暴露了党的组织。北方局、顺直省委和北京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在敌人大肆搜捕的时刻，安幸生不顾个人安危，一面销毁党内文件，一面通知大家转移。10月21日，安幸生和王荷波按约定时间，赶到宣武门参议院旧址，向大家传达党的决定。当决定传达后，部分人员刚刚撤离时，京师警察赶到，安幸生等人不幸被捕。

在狱中，安幸生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当他得知北京市委书记李渤海叛变，证实他身份以后，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是在孙中山先生联共的政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别的无可奉告。”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于同年11月21日在京师法院地方看守所后门杀害了安幸生等18位共产党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安幸生等18烈士忠骨安葬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和董恂如抬着安幸生的骨殖坛走向墓地。1986年9月14日，安幸生母校（现天津市第三中学）在校庆85周年之际，隆重举行了安幸生烈士塑像揭幕仪式，邓颖超亲笔为塑像题写了“安幸生烈士纪念碑”碑文、

（杨光祥）

## 子牙河畔的明灯

1932年4月，子牙河畔诞生了当时天津地下党唯一的农民党组织——西北乡农民支部。它象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为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 在风雨中诞生

1931年8月末的一天，骄阳烤晒着秋雨冲刷过的大地。在泥泞、残破的永定河南堤上，走着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青人。他，就是刚刚从敌人监狱中出来，又接受中共河北省委派遭到天津西北乡三河头村（即现北郊区上河头、中河头、下河头村）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孙振武。

一路上，孙振武耳边回响着临行前党组织负责同志的话：“三河头村距市区较远，又是安幸生（即安毓文）烈士的家乡。那里偏僻隐蔽，又有群众基础，你要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开展党的工作。”按照党的地下关系的安排，孙振武化名孙晓文（暗指晓得毓文之意），公开身份是三河头小学的高小教员。

三河头小学官称“天津县公立第48小学”，有三、四十个学生，一名教师。孙振武的到来，使这所乡间小学逐渐发生了变化。搅动全村的，是他免费为村民办起了“平民夜

校”。

每当傍晚，袅袅炊烟还没在村子上空散尽，夜校就开课了。40多个青壮年农民坐满教室，他们第一次拿起平民课本，听孙老师讲课。

“衙门钱，一溜烟；生意钱，六十年；种田钱，千万年”。一字一句唤起人们的深思。他们想起当年安幸生回家时讲过的将来贫苦农民要做这个社会的主人的话，开始理解了“劳工神圣”的道理，心中燃起“求生存、争解放”的愿望。

孙振武讲课浅显易懂，和蔼亲切。村民们既把他当做尊敬的老师，又把他当做自己的兄弟，一些人经常在课后找他问这问那、拉家常。其中身材高大、亮脑门儿的农民丁春发和个头不高、稍清瘦的青年、安幸生的堂弟安毓树引起孙振武的注意。这俩人常向孙振武请教，同时也热情地向他介绍这里的村俗，谈起世间的不平和自己美好的憧憬。

有一天，安毓树悄声问孙振武：“孙老师，你是共产党吧？”

孙振武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道：“当共产党会坐牢，还可能被杀头，你们不怕吗？”

“不怕，毓文哥早就做出样子了。我们大伙儿都巴望着共产党能到村里来”。丁春发也忍不住说：“前几年，小学校来了一个叫刘云卿的老师，听说他也是共产党。是他领着我们把地主组织的‘青苗会’、‘护庄队’搅和散了。现今儿百姓们还为脱开这不合理的摊派叫好呢！可惜，时间不长他就走了。共产党专为老百姓做事，我们都是热血汉子，也想当共产党”！

他们的热情，直率深深感动了孙振武。他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好样的！如果你们真有决心，那就先给我帮忙吧！”

当时，天津党的印刷机关已无法工作，孙振武承担了为党刻印文件，传单的任务。这俩人使孙振武的夜间工作增添了帮手。他们学着孙老师的样子，用棉被将窗子遮严，然后打开油印机开始印文件。一张张沾满墨香的纸片，使这两个青年了解了国际风云，天下大事，也明白了共产党的主张，思想渐渐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一次，交通员不知什么原因没按约定时间取文件。丁春发看出孙振武着急的心情，主动说：“让我去送吧！我有方便条件。”

孙振武知道，他家有辆小驴车，农闲时，常往返天津拉脚儿。根据对丁春发的了解，孙振武点头同意了。

丁春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严冬悄然离去。初春四月的一个夜晚，劳累一天的人们已经睡去，小学校孙振武宿舍的油灯却还亮着。屋内，灯光映着三张刚毅、兴奋的脸。孙振武带领两名新党员面对墙上熠熠生辉的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共产党……”，伴着低沉、有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天津西北乡农民支部诞生了。孙振武任支部书记。

## 领导反放淤斗争

1934年夏，永定河发了大水。汤汤洪流挟带大量泥沙，将三河头附近南泓22号房子大堤冲溃。洪水吞没了庄稼，许

多农民失去生计，只得靠搂草、拾柴卖钱糊口。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竟断然将三河头一带辟为第四放淤区，进一步向农民转嫁灾难。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农民中郁积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农民党支部立即商讨对策。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团结乡亲们坚决反对当局的放淤政策！”孙振武斩钉截铁地说。

“团结，对我们农民太重要了。以前我们和杨柳青地主斗争失败就是因为心不齐！”

爱动脑筋的安毓树说出这些话，使孙振武很高兴。他清楚，三河头一带原为永定河散水均沙之地，土地瘠薄，且连年水害，多数百姓不得不租种杨柳青大地主的地。因年年续租，又要送礼，百姓负担很重。前两年，自己接受组织安排，回家乡阜城执行任务时，他俩曾串联部分农民向杨柳青大地主争取“永佃权”，但终因心气不齐，斗争不得结果。现在，他们能自己总结经验，这是多么可喜的进步！

“当局的放淤政策，不仅咱贫民反对，地主、绅士为保护自个儿的利益也反对。我看，只要把大伙都动员起来，准成！”丁春发也发表了意见。

“你们说得都很好，这样吧，咱们分头联络，一边组成一个农民协会，一边发动乡亲们和当局斗争”。孙振武果断地作了决定。

几天后，一支由四、五十人组成的农民协会在三河头小学秘密成立了。安毓树被推举为农会主任。

1935年4月24日上午，在多次上书请愿和代表交涉无效后，农会会员们串联的48个村的代表，在三河头小学召开